



梁实秋

文坛沉浮录

李正西 任合生 编

梁实秋
朱坛
沉浮录

朱心
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实秋文坛沉浮录/李正西,任合生编.-合肥:黄山书社,1992.1
(1999.2重印)

ISBN 7-80535-001-9

I. 梁… II. ①李… ②任… III. ①梁实秋(1902~1987)-回忆录
②梁实秋(1902~1987)-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1764 号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市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25 字数:340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8001—16000册

定价:15.00元

·因印装质量问题,妨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·

悼念梁实秋先生(代序)

冰 心

今晨八时半,我正在早休,听说梁文茜有电话来,说他父亲梁实秋先生已于本月3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逝世了。还说他逝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,劝我不要难过。但我怎能不难过呢?我们之间的友谊,不比寻常呵!

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,我们是在1923年同船到美国去的,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,因为清华的梁实秋、顾一樵等人,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,叫做《海啸》,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。有一次在编辑会后,他忽然对我说:“我在上海上船以前,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,曾大哭了一场。”我为他的真挚和坦白感到了惊讶,不是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么?为什么对我这个陌生人轻易说出自己的“隐私”?

到了美国,我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。一年之后,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。因为同在美国东方的波士顿,我们就常常见面,不但在每月一次的“湖社”的讨论会上,我们中国学生还在美国同学的邀请下,为他们演了《琵琶记》。他演蔡中郎,谢文秋演赵五娘,顾一樵演宰相。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,拉我顶替了她。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英国写给他的信说“实秋真有福,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娇”。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,彼此对谑的话,我本是从来不说的,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古,我自己也老了,回忆起来,还觉得很幽默。

实秋很恋家,在美国只呆了三年就回国了。1926年我回国

后,在北京,我们常常见面。那时他在编《自由评论》,我曾替他写过“一句话”的诗,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《古老的北京》。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留稿,都是实秋好多年后寄给我的。

1929年夏我和文藻结婚后,住在燕京大学,他和闻一多到了我们的新居,嘲笑我们说:“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,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。”亏得他们提醒,因为我和文藻都不抽烟,而且喝的是白开水!

七七事变后,我们都到了大后方。40年代初期,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。他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,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,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。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。我记得1940年我们初到重庆,就是他和吴景超(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)的夫人业雅,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,我们到了日本,实秋一家先回到北平,1949年又到台湾,我们仍是常通消息。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,还挂有实秋送给我们的一幅字,十年浩劫之中,自然也同许多朋友赠送的字画一同烟消火灭了!

1951年我们从日本回到了祖国,这时台湾就谣传说“冰心夫妇受到中共的迫害,双双自杀”。实秋听到这消息还写了一篇《哀冰心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传我这里,我十分感激,曾写一封信,托人从美国转给他,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,因为他是北京人,文章里总是充满着眷恋古老北京的衣、食、住……一切。

多么不幸!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,他就在前一天与世长辞了!

实秋,你还是幸福的,被人悼念,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,少流一些眼泪,不是么?

1987年10月5日

目 次

- 1 悼念梁实秋先生 (代序) 冰 心

梁实秋自述

- 3 岂有文章惊海内
——答丘彦明女士问
- 28 槐园梦忆
——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
- 100 我在小学
- 109 记得当时年纪小
- 113 正月十二
- 117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
- 121 清华八年
- 148 苦雨凄风
- 155 海啸
- 158 琵琶记的演出
- 164 忆《新月》
- 172 忆青岛
- 178 平山堂记
- 181 副刊与我
- 192 丁香季节故园梦

193 十句话

附 录

- 197 今我往矣，雨雪霏霏 丘彦明
——记梁实秋教授最后在院的日子
- 203 我所知道的父亲 梁文骐

梁实秋忆念他人

- 209 怀念胡适先生
- 220 胡适先生二三事
- 226 忆冰心
- 230 忆老舍
- 236 忆沈从文
- 239 悼念余上沅

梁实秋文坛沉浮的背景资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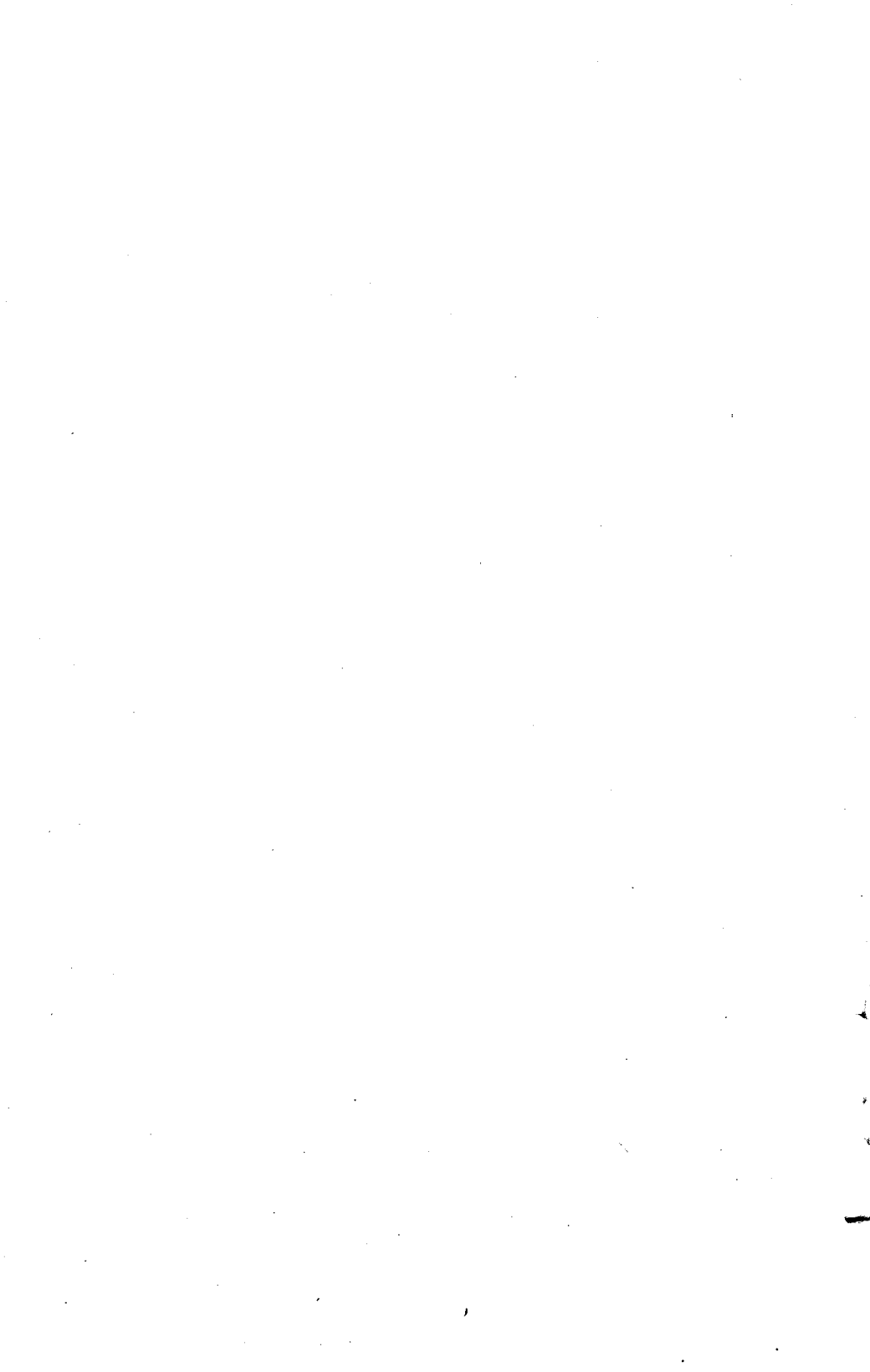
- 247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
- 265 文人有行
- 270 文学与革命
- 279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
- 289 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
- 292 答鲁迅先生
- 298 “资本家的走狗”
- 300 编者的话

- 302 “与抗战无关”
304 关于“文艺政策”

有关批判和研究梁实秋的资料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11 | 头 | 鲁 迅 |
| 312 | 卢梭和胃口 | 鲁 迅 |
| 315 |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| 郁达夫 |
| 325 | 关于卢骚 | 郁达夫 |
| 328 | 文学和出汗 | 鲁 迅 |
| 330 | “好政府主义” | 鲁 迅 |
| 332 | 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 | 鲁 迅 |
| 347 | 冷静的头脑 | |
| | ——评驳梁实秋的《文学与革命》 | 冯乃超 |
| 362 | “与抗战无关” | 罗 荪 |
| 364 | 再论“与抗战无关” | 罗 荪 |
| 367 | 谈“抗战八股” | 宋之的 |
| 369 | 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 | 鲁 迅 |
| 371 | 关于梁实秋的“抗战无关论”之我见 | 柯 灵 |
| 374 | 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 | 罗 钢 |
| 401 | 记梁实秋先生——一些片断 | 陈祖文 |
| 408 | 文章与前额并高 | 余光中 |
| 415 | 后记 | |

梁实秋自述



岂有文章惊海内 ——答丘彦明女士问

“岂有文章惊海内，漫劳车马驻江干”是杜工部的名句，也是他谦己之语。当时杜公四十九岁，自嗟老病。我今年逾八旬，引杜诗为题以自况，乃系实情，并非谦拗。丘彦明女士惠然来访，我如闻跽音。出示 22 问，直欲使我之鄙陋无所遁形，秉笔覩缕，不能成章，惭愧惭愧。

丘：梁教授，您曾经跟我提过，当您从美国留学返国时，令尊遗憾的说：“若我们是富有人家，我一定让你关在家里再读十年书，然后再出去做事。”好象，北平有名的“厚德福饭庄”是您们的产业之一。能否谈谈您的家世？

梁：我没有什么辉煌的“家世”可谈。

我的远祖在河北(直隶)沙河一带务农。我的祖父到了北京谋生，后来得到机会宦游广东，于是家道小康。返棹北归，路过杭州小住，因家父入学应考，遂落籍钱塘。从此我的籍贯一直是浙江钱塘。事实上我是前清光绪二十八年(民前十年)夏历十二月八日生于北京。1915 年我小学毕业，投考清华学校，清华是由各省摊派庚子赔款而设立的，所以学生由各省考送。为了籍贯的关系，我在直隶省京兆大兴县署(北京东城属大兴县)申请入籍，以便合法的就近在天津应考，从此我的籍贯就是北平了。我的母亲是杭州人。

老家在北京东城根老君堂。祖父自南方归来，才买下内务部街 20 号的房子。那时不叫内务部街，叫勾栏胡同，不知道为什么

取这样一个地名(勾栏本是厅院的意思,元以后妓院亦称勾栏)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,有正院、前院、后院、左右跨院,共有房屋 30 几间,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。“天棚鱼缸石榴树”都应有尽有。我曾写了一篇《疲马恋旧秣,羁禽思故栖》,是怀念我的这个旧居之作。这篇文章被喜乐先生看见了,他也是老北京,很感兴趣,根据我的描写以及他对北平式房屋构造的认识,画了一幅我的旧居图送给我。他花了好多天的功夫,用了 70 多小时,才完成这一幅他所最擅长的界画,和我所想念的旧居实际情形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,只是画得太漂亮了一些。现在的内务部街 20 号不是这个样了。

大陆开放后,我的女儿文蔷曾到北平探亲,想要顺便巡视我的旧居,经过若干周折,获准前去一视。大门犹在,面貌全非。里面住了 19 家,家家檐下堆煤举火为炊,成为颇有规模的“大杂院”。鱼缸仍在,石榴海棠丁香则俱已无存,惟后跨院屋中一个“隔扇心”还有我题的几个字。她匆匆的照了不少张相片,我看了觉得惨不忍睹。她带回了一样东西给我,我保存至今——从旧居院中一颗枣树上摘下来的一个枣子,还带着好几个叶子,长途携来仍是青绿,并未褪色,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。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,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。

我的家不是富有之家,只是略有恒产,衣食无缺。北平厚德福饭庄不是我家产业,在此不妨略加解释。我父亲是厚德福的老主顾,和厚德福的掌柜陈莲堂先生自然的有了友谊。陈莲堂开封人,不但手艺好,而且为人正直;只是旧式商人重于保守,不事扩张,厚德福乃长久局限在小巷中狭隘的局面。家父力劝扩展,莲堂先生心为之动,适城南游艺园方在筹设,家父代为奔走接洽,厚德福分号乃在游艺园中成立,生意鼎盛。从此家父借着代筹,陆续在沈阳、哈尔滨、青岛、西安、上海、香港等地设立连锁分店,家父与我亦

分别小量投资几处成为股东。经过两次动乱，一切经营尽付流水，这就是我家和厚德福关系之始末。

本来我家属于中产阶级，民元袁世凯嗾使曹錕部下兵变，大肆劫掠平津，我家亦遭荼毒，从此家道中落。我自留学归来，立即就教职于国立东南大学，我父亲不胜感慨，他以为我该闭户读书，然后再出而问世。知子莫若父，知己也莫若自己。父母的训导与身教，使我知道勤俭二字为立身处世之道，终身不敢逾。

丘：您还说过小时候您很顽皮，惹了祸总是哥哥受罚，而您逃过了处罚，请说说您的童年。

梁：我的童年生活，只模糊的记得一些事。

北平有一童谣：

小小子儿，
坐门墩儿，
哭哭啼啼的想媳妇儿。
娶了媳妇儿干什么呀？
点灯，说话儿；
吹灯，作伴儿；
早晨起来梳小辫儿。

梳小辫儿是一天中第一件大事。我是在民国元年才把小辫儿剪了去。那时候我的辫子已有一尺多长，睡一夜觉，辫子往往就松散了，辫子不梳好是不准出屋门的。所以早起急于梳辫子，而母亲忙，匆匆的给我梳，梳得紧，揪得头皮痛。我非常厌恶这根猪尾巴。父亲读《扬州十日记》《大义觉迷录》之类的书，常把满军入关之后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故事讲给我们听，我们对于辫子益发没有好感。革命后把辫子一刀两断，十分快意。那时候北平的新式理发馆只有东总布胡同西口路北一处，座椅两张。我第一次到

那里剪发，连揪带剪，相当痛，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。

民国以前，我的家是纯粹旧式的。孩子不是一家之主，是受气包儿。家规很严。门房、下房，根本不许涉足其间。爷爷奶奶住的上房，无事也不准进去，父亲的书房也是禁地。佛堂更不用说。所以孩子们活动的空间有限。室内游戏以在炕上攀登被窝垛为主，再不就是用窗帘布挂在几张桌前作成小屋状，钻进去坐着，彼此作客互访为乐。玩具是有的，不外乎从“打糖锣儿的”担子上买来的泥巴制的小腊签儿之类，从隆福寺买来的小“空竹”算是上品了。

我记得儿时的服装，最简单不过。夏天似乎永远是竹布一身裤褂，白布是禁忌。冬天自然是大棉袄小棉袄，穿得滚圆臃肿。鞋子袜子都是自家做的，自古以来不就是以“青鞋布袜”作为高人雅士的标识么？我们在童时就有了那样的打扮。进了清华之后，才斗胆自主写信到天津邮购了一双白帆布鞋，才买了洋袜子穿。暑假把一双双的布袜子原样带回家，被母亲发现，才停止了布袜的供应。布鞋、毛窝，一直在脚上穿着，皮鞋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

小孩子哪有不馋的？早晨烧饼油条或是三角馒头，然后一顿面一顿饭，三餐无缺，要想吃零食不大容易。门口零食小贩是不许照顾的，有时候偷着吃“果子干”、“玻璃粉”或是买串糖葫芦，被发现便不免要挨骂。所以我出去到大鹑鸽市进陶氏学堂的时候，看见卖浆米藕的小贩，驻足而观，几乎馋死，豁出两天不吃烧饼油条积了两个铜板才得买了一小碟吃。我的一个弟弟想吃肉，有一天情不自已的问出一句使母亲心酸的话：

“妈，小炸丸子卖多少钱一碟？”

革命以后，情况不同了。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。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，可以随时在院子里拍皮球、放风筝、耍金箍棒，可以逛隆福寺，吃“驴打滚儿”、“爱窝窝”。父亲也带我们挤厂甸。

念字号儿，描红模子，读商务出版的“人手足刀尺，一人二手，开门见山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……”这一套启蒙教育，都是在炕桌

上,在母亲的苕帚疙瘩的威吓下,顺利进行的。我们没受过体罚。我比较顽皮淘气,可是也没挨过打。我爱发问,我读过“一老人,入市中,买鱼两尾,步行回家”之后,曾经发问:“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?”

父亲给我们订了一份商务的《儿童画报》,卷末有一栏绘一空白轮廓,要小读者运用想象力在其中填画一件彩色的实物。寄了去如果中选有奖。我得了好几次奖,大概我是属于“小时了了”那一类型。大房后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装订成册的《吴友如画宝》,虽然说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,画中大意往往能体会到一大部分,帮助我了解社会人生不浅。性的知识,我便是在八九岁时从吴友如几期画报中领悟到的。

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。

丘: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过?林徽音的丈夫——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,是您清华同学,好象同宿舍同寝室是不是?作家冰心和她的先生是您留学美国的同学。请您除了告诉我们求学经过之外,能不能告诉我们影响您最深的一些师长和同学,或是交往情形。

梁:我求学经过很顺利。在清华学校一住就是八年。进去的时候是14岁的孩子,舍不得离开家,临去时母亲哭了,我也潸然。离开清华赴美留学的时候,我已是22岁的少年,舍不得离开我所爱的人和我所爱的国家,但还是踏上了征途。我的行李箱里装的是一部前四史(这是我父亲坚持要我带的,要我三年之内读毕,我交了白卷),两只珐琅花瓶一个珐琅香炉,及一些杂物,包括一面长达几近一丈的绸质大国旗(五色旗)。这国旗派上了用场,纽约留学生举行孙中山先生哀悼会时,主席罗隆基借用了我这面国旗悬在台上。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样大的国旗。我在清华八年的生活,具见《清华八年》一文,收在《秋室杂忆》里。

你提起的梁思成吴文藻(冰心的先生)是我同班的同学。我这一班起初约90人,毕业时只剩约六七十人。梁思成不是我同寝室

的，寝室每年一换，我最后一年同寝室的是顾毓琇、吴景超、王化成。吴文藻是我同班同学，他的夫人谢冰心是燕大毕业的，和我们同船去了美国，所以成了相识。

我这一班同学人数众多，至今我还忆得十之八九。例如：作过葡萄牙公使的王化成，出使土耳其、巴西的李迪俊，曾任主计长的吴大钧，改良稻种有成的李先闻，擅长声乐的应尚能，专攻电影的孙瑜，研究天文的张钰哲，精通语言学的李方桂，杰出的陆军将领孙立人，建筑学者梁思成，社会学家的吴景超与吴文藻，兴办水泥事业的徐宗涑，电机学家的顾毓琇，路透社经理的赵敏恒等。

求学期间影响我最大的，首先是小学的老师周香如先生，他给我打下国文的基础，随后是清华的徐镜澄先生，他教我如何作文。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，使我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严肃的古典，一部分由于他的学识精湛，一部分由于他精通梵典与儒家经籍，融会中西思潮而成为新人文主义，使我衷心赞仰。胡适之先生，长我11岁，虽未及门，实同私淑，他提倡白话为文，倡导自由思想，对我有很大的启迪作用。

同学之间，闻一多对我影响很大。他学美术，本来专攻西洋油画，后来他发现国人在油画无法与西人颉颃，乃抛弃画笔，钻研中国古典文学，早年作白话诗至是亦为之搁笔。他有文才，重情感，讲义气。在清华时，课余之暇，辄相与论文，我对文学的兴趣有很大部分是他激发出来的。抗战前数年，我常作政论刊于报端，一多曾讥我为不务正业，甘与罗隆基为伍，迨抗战军兴，一多竟卷入政治旋涡，与罗隆基合流而终不免于意外之灾。他给我画过两张画，一张是水彩画《荷花池畔》，画的是清华园内的胜景，于我有纪念性。另一张是油画的我的半身像，当时他正醉心于印象派的理论，不但把我画成粗眉大眼，而且把我的怒发画成为绿色，活象夜叉。这两张画可惜都失落了。他给我刻过一个闲章——《谈言微中》——一白文，也不见了。他的第一部诗集《红烛》是由我交给郭沫若转

给泰东出版的。

另一位同学影响我甚巨的是潘光旦。他比我高一级，但是在纽约往还了足足一年。他和吴文藻合住哥伦比亚大学黎文斯通大厦里的一间宿舍，我常去找他聊天。他学的是优生学，以改良人种为第一要义。遗传最重要，他举出我国的大书法家以及著名的伶人，大抵是历代相传的世家，其关键在于婚姻的选择。因此他最钦佩丹麦，管制婚姻最为彻底，让优秀的人多生子女，让庸劣的大众少生子女，种族才得健全。这样的想法，和我正在倾倒于卡赖尔的英雄崇拜的倾向正相符合。我对于所谓“普罗”的看法似乎找到了理论的根据。光旦对于中国的学问也有根柢。他说“民为贵”的思想创自孟子，孔子不曾说过这样的话，孔子的理想是贵族政治。他又指出，海外华侨是我们的优秀分子，逃难出关的山东老乡也是优秀分子，历史上南渡的客家也是优秀分子，因为他们有魄力远走高飞开拓新局。他对于谱牒之学深感兴趣。我听他的议论久了，不自觉的深受他的影响，反映在我的文学观上。

丘：抗战时，左派人士攻击您提出“艺术与抗战无关”的理论。不久前，柯灵还写文章为此事替您“平反”。其实爱国与纯粹文学创作并不冲突，您曾在北平沦陷那天，对您的大女儿文茜说：“孩子，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。”您想，抗战时左派人士的借题批判，是否为与鲁迅笔战的延长与后遗症？

梁：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柯灵先生为文给我的“抗战无关论”的罪名平反。实在不胜感慨。平反也者，是为冤狱翻案，是为误判纠正，当然是好事。不过我实际上并未入狱，也未奉到判决书。有些事情，是是非非，原无需等待历史来证明的。

我附着着说明一点：我们凡事不可犯“偏执”的毛病，不可强求一致。国家需要统一，不容分裂，这是当然的事。但有许多事却不必统一。以文艺而论，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不可能的。鲁迅译的“文艺政策”是苏联的文艺政策，企图通过当时的第三国际利用文艺推